

民生政策 充分讨论才有共识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关于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加强科研项目管理和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3个文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个别科研人员违纪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为此教育部要求高校健全诚信体系，建立科研人员科研诚信档案。

科研诚信 才会有“大师”辈出

科学研究本应是最严肃、最求真的学术研究，然而近年来，科研失信的事件时有发生：科研经费在部分人眼中成了“唐僧肉”，不少项目经费并没有用在科研上，而是用在了科研人员的福利劳保、旅游娱乐等活动中，甚至有人采取非法手段套取科研经费。审计署去年的审计工作报告就披露，有单位扩大科研经费的预算支出，以项目名义发放近亿元福利；中国科协的调查也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科学研究一旦失去纯洁性、公信力，其后果不可小视：一方面，科研工作者的不诚信很容易在社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科研的失信还对国家的科研创新形成致命打击，这也是“大师”难出的根本原因所在。不难想象，当学者、教授把科研活动当作工具，追名逐利，连做人的基本诚信都不具备，还谈何从事科研以造福人类？当“要想获得重大项目，与其努力研究，还不如与科研管理机构和相关专家搞关系”，这样的科研经费获取模式，又怎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激情？

因而，教育部要求高校健全诚信体系，建立科研诚信档案，规范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的管理，无疑很有必要。特别是随着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不断增长，科研经费已是一笔巨大支出，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达到13.1%，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科研经费管就不但是规范科研经费使用、根除学术腐败之举，还带有替纳税人看好“钱袋子”的意义。

如何以诚信档案规范科研人员的失信行为？其一，必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科研领域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惩罚，一些存在学术腐败的科研机构和人员并不会因为自己的造假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因而，在建立诚信档案后，还应进一步建立科研诚信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不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美国贝尔实验室2002年开除了论文造假的科研人员舍恩，在对这一“物理学界50年来最大的造假事件”的处理中，舍恩本人不但被贝尔实验室开除，甚至被母校德国康斯坦斯大学褫夺了博士学位。因为康斯坦斯大学所在的德国巴符州有一部《大学法》规定：获得学位后的“不体面行为”也可成为褫夺学位的依据。

其二，还应让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过程透明化、公开化。现在政府部门的预算都公开了，科研经费没道理不公开。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万元以上的科研计划都特别严格，以承担欧盟科技计划的研究人员为例，他们的经费细化到每一天的开支，比如参加学术会议是坐火车还是乘出租车，必须提前一年编制好预算，严格执行，到期不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者，取消其项目申报资格。反观我们的科研经费使用，却经常是一笔糊涂账。让科研经费透明公开，加大公众监督，迫在眉睫。

英国《自然》杂志曾说，“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诚信状况，不仅要考察发现了多少学术丑闻，还要看对这些丑闻的调查和处理程度”。为科研人员建立诚信档案，以法律法规来惩罚科研失信，当是根治学术腐败、规范科研管理的一个必要举措。 李龙

追逐了8年，传菜工杨绍平的“律师梦”向现实迈进了扎实的一大步。8年前，因为贫穷，傣族小伙杨绍平瞒着家人放弃了上大学，准备自学法律专科。然后再升本，拿到毕业证后参加司法考试。2012年11月22日，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公布，杨绍平通过了。

传菜工的律师梦 传递怎样的梦想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令人心酸的励志故事。假如不是贫穷，杨绍平当初也不必辍学，他的“律师梦”实现起来也许不会这么艰难。“心若在梦就在”，杨绍平一边打工一边到北大自习室苦读，国家司法考试成绩的通过，算是为他的人生履历增添了一抹温暖的底色。即便是你这样的旁观者，在观照杨绍平的命运轨迹时，因为他有可能从传菜工向律师转身，我们的感慨中也不会只剩下一声叹息。

杨绍平是千千万万普通青年里的一页。很多时候，我们在浏览有关普通青年的新闻时，总是隐隐透露着一股愤懑、无助、挣扎的情绪，因为社会不公、贫富不均、阶层分化这些社会命题都会被嵌入到“阶层固化”“拼爹游戏”等话题的内核里，“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不断呈现。还好，杨绍平8年的追梦之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青年是如何转身为梦想的实践者。

一个真正的普通青年，他敢于直面各种问题乃至不美好的事情；一个真正的普通青年，他也不会流于愤世嫉俗，不会以发泄牢骚为快。不低头，不叹息，勇于向自身现实挑战，这是杨绍平走出的路。当传菜工杨绍平的“律师梦”即将照进现实，这固然是一个底层民众“华丽”转身的“标本”，但我们并不能乐观地以为，这个“标本”一定具有普遍性。对于这些底层个体而言，他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做一个更努力更奋进的人。但是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当有人努力转身改变命运时，社会能否为他们提供更大的空间？

向朋友讲述传菜工杨绍平追逐“律师梦”的故事，朋友上来就问：“当了律师以后的日子就一定能够好吗？”我知道朋友的疑问并不是要为杨绍平泼冷水，他只是担心社会到底能给杨绍平提供多少资源。对于杨绍平这样的普通青年而言，真正实现“阶层翻身”，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两句祝福就可以实现的，他更需要坚定信念，继续努力。 陈方

近期，网络上的热点不断，一些涉及民生的政策在网民之间引起激烈争论，包括闹黄灯、异地高考以及打车难、摇号、限行、限购等一系列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话题。

处罚闹黄灯、异地高考，作为重要的民生政策，甫一公布就争议频频，而解决打车难、摇号、限行、限购等民生政策，或久久解决不了问题，或面临公平性等质疑。这不仅令政府公信受损，也让民众对相关政策的施政能力，产生怀疑。

这些政策之所以引发民众议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台前缺乏充分的公共讨论，这些政策的制定，相关部门多是内部研究，不是透明决策。

或许，许多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前，做过研究论证，但无论如何，这些都难以代替民众广泛参与的公共讨论。政府有政府的视角和智慧，民众有民众的眼光和见地，这二者是互补的，缺一不可。政府看到闹黄灯带来的交通安全风险，民众则更看到复杂的交通路况使得许多时候闹黄灯不

易避免。政府对打车难，一次次拿出整治措施，而在民众眼中，投诉拒载却仍非易事。民众的想法尽管许多时候是感性的，但他们表现出来的草根思维和智慧，却有独特的决策参考价值。

在“闹黄灯”等公共讨论中，尽管，一开始网络讨论非常激烈，各种声音都有，但在这样的集体讨论中，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逐渐沉淀下来，政府和民意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逐渐找到共识。其中，在“闹黄灯”争论所达成的安全行车共识，是公安部门花多少宣传费也换不来的结果。

公共政策不经由公共讨论，就不可能达成共识。在网络时代，各种技术条件，为便捷的公共讨论创造了可能，因此，政府部门应善用这些条件，运用媒体、网络等渠道搭建公众讨论平台。如，现在许多部门都有政务微博，而通过微博访谈等形式，很容易与民众展开互动。

十八大报告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可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许

多政府部门还是存在着替民众包办一切的思维，忌讳将政策付诸公议。事先公布民生政策方案，让民众讨论，总比事后招来批评好。当看到，透明的信息发布，充分的公共讨论，只会让民众对政策接受形成心理准备，这就让政策变化对民众心理的冲击降至最小。相反，如果不经讨论，实行政策的突袭，让民众毫无准备，很容易让民众产生不适应乃至惶恐心理，这其实是最大的不稳定。

当下社会存在着网上和网下两个舆论场。这两个舆论场并没有打通。如今，很多议题在网上谈得很热闹，而网下却没法谈。而网络舆论场中固然有理性的声音，但是泥沙俱下，众声喧哗，因而，主流媒体专业而理性的声音同样也不可或缺。

欲让公共政策切实发挥作用，欲更好地达成共识，找到解决方案，势必要打通网上和网下两个舆论场。如此，才能让更多的理性声音传递出来，也才能让公共舆论空间发挥更多的正能量。 京文

“不小心”收多了



不光官场，老百姓过日子也讲究礼尚往来，比如你送来一碗饺子，我端去一盘肉夹馍，朋友邻里关系也因此显得和美，但如此温情婆妈的百姓伦常不可能生产出千万富翁。官场的温情婆妈行为却深藏彪悍的生产力，在礼尚往来中获取巨额财物的不光有收礼“不小心”的杨红卫，还有很小心地送礼的

各色趋附者。你送我一百万，我请你喝杯茶附带给你个章，你得到的岂不是一杯茶钱算计？杨红卫所谓的收多了，是指相对于他自己付出的茶钱而言，其实，相对于他用权力给对方输送的利益，多乎哉，不多也。杨红卫“不小心”收多了，百姓们的利益也就“不小心”变少了。 文/小强 图/春鸣

云南楚雄州原市长杨红卫案近日开庭。杨被指控自2003年以来单独或与其妻余某共同受贿人民币974万余元，黄金、钻戒等合人民币18万余元。夫妻俩一个办事、一个收钱。杨坦言，“礼尚往来，收礼在官场是平常事”，不经意间就收多了。 《羊城晚报》

“污染出边界才上报” 透出的荒唐

山西长治苯胺泄漏，5天后才上报山西省政府。目前，苯胺泄漏事故4名责任人被撤职。尽管事故发生后当地采取了封堵、拦截措施，但山西境内河道长约80公里受到影响，平顺县和潞城市28个村、2万多人受到波及；而河北邯郸方面5天后才被通报，污染已入境，虽有紧急应对，但毕竟仓促，市民则紧急在商场、超市抢购生活用水。

5天的时间，各相关方面本该可以充分应对。为何这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流逝？长治市新闻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平有一番奇谈怪论：“我们都是按照规定程序报的，并不是晚报5天。发生了污染以后，只要污染不出长治的边界好像就不用往省里报，自己处理就行，一出边界了这才需要报。”居然还有这样违反常识的规定？污染出了边界再上报，再等毗邻地区作出反应，黄花菜都凉了。轻则让人手忙脚乱，重则损害官民，这到底是与邻为善，还是以邻为壑？无论是去年3月通过的《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还是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都没有这样的规定。瞒报、迟报之后造成的二次伤害可能更胜于一次伤害。

面对突发事件、事故，要求必须及时报告，为的就是尊重规律留出充分应对时间和机会，尽一切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此次苯胺泄漏迟报，导致山西和河北受影响，即是一个明证，所谓出了边界才上报，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无论是用“按规定程序报”来搪塞，还是是一些地方搞某些事故报告的潜规则、小动作，实质都是为了掩盖事故，想使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体现在公共治理上，还是老一套的“捂盖子”思维。捂不住了，又百般辩解，显得自己很用心很尽力很无辜。在这样一个信息快速流动时代，这种“捂盖子”思维，形如自以为穿衣的“裸奔”者，丢人现眼，徒使人笑。

是群众生命安全与健康重要，还是乌纱帽重要？一些官员之所以总是选择后者，说到底，还是对迟报的惩罚不严厉。不严厉，说到底还是认识不到位，以为一起事故而已。迟报、瞒报的背后，乃是置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于不顾，这涉及的是官员的宗旨与党性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在根本性问题上都敢放纵，还怎么指望官员尽心竭力为人民服务？如果无论你是谁，涉及到什么人，都一视同仁，一律重惩，看谁还敢如此蝇营狗苟？ 郝朋

新年上班第一天，北京迎来今年首个婚姻登记高峰日。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全市有7000多对新人网上预约在1月4日登记结婚，而实际领证的新人数有望突破1万对。为了赶在好日子里结婚，3日午后就有人开始排队了。(1月4日《北京晨报》)

1314 结婚潮 幸福爱情不能靠“赶集”

2013年的1月4日，貌似平常的一个日子，因为其谐音为“爱你一生一世”而被称为“万年真爱日”。在经过了“世界末日”的谣言洗礼后，网络上“让我们结婚吧”的帖子到处飞扬。

不能完全否定年轻人对幸福爱情的守望和期待，更不能否定年轻人追求“一生一世”爱情的美好。在这个真爱缺乏的岁月里，这或许是对真爱坚守的再次落地。但是，爱情不是谐音创造的，真正美好的爱情是男女双方共同营造的，更有着对爱情的理解和坚贞。而仅仅为了讨个好彩头，就挤在这一天里去突击结婚、登记，是不是也有点盲目的冲动。登记后的事情、结婚后的事情，还有很多要去。排山倒海式的赶在1314去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带来的被动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较前年同期增长17.1%，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中国式离婚”成为一个令世人关注的现象。而专家认为离婚率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快餐式”爱情造成的。

在这个忙忙碌碌的时代里，很多人已经没有了谈一场正儿八经恋爱的时间，以往那种依靠时间和岁月的积淀而见证的爱情越来越少，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一场酒会，一段舞蹈，一条短信，一个微信换来的“爱情”越来越多，新时代的爱情已然进入了泡面时代。不能说这里面没有真正的爱情，可是很多爱情却是来去匆匆，爱了就牵手也许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不爱就放手，也许就因为一句寒冷的话语，有人在结婚登记处刚刚领到红本本，转身就步入离婚处换来了绿本本。结婚和离婚都在赶大集，比农贸市场还热闹。

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远离了海枯石烂，我们远离了山盟海誓，爱情，好像越来越遥远了。于是我们会被爱情天梯感动，于是我们会被肝胆相照前夫动容，于是在原本仅仅属于爱情的简单举动出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泪流满面。

想起了《非诚勿扰》的一期节目，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最后被全体美女灭灯，他最后对心动女生表白时这样说：“我给了不是你富足的生活，可能给你一个浪漫的爱情，我能给你做99个气球写上我爱你，放飞到你的窗前。”听了这话很多女生都哭了，一个女孩哭着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已然丢失了纯美的爱情，我想要爱情，我也想要面包。”也许正是源于此吧，我们的爱情已然成为买卖。

人与人的相识、相知、相守，是一个美丽的缘分，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前世的500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当然这句话有点迷信色彩，可是道理却是很明白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缘分，我们更需要沉淀着美好能量的爱情，而不是去为了1314去赶个爱情的农贸市场。

年轻人跟风“好日子”盲目结婚，“一生一世”寓意虽然好，但婚后是否一生一世相守，还需要新人用心建设家庭，用爱包容对方并适当掌握经营婚姻的技巧。 郭元鹏

闯黄灯暂不处罚是民意价值体现

“闯黄灯扣6分”是开年以来最受热议话题。日前，公安部交管局专门通知，要求各地交警部门对目前违反黄灯信号的，“以教育警示为主，暂不予以处罚”。

争议不到一周，官方做出了回应，这个结果是尊重民意的表现，值得肯定。当然，公安部做出“暂不处罚”的决定，给人的感觉，是公共管理上演了一个“乌龙”。如果之前能充分尊重民意，事情也不至于如此尴尬。必须强调，公安部“暂不处罚”，并不意味着“闯黄灯”就正当，就不需要治理。黄灯作为红绿灯之间的缓冲，

意义和功能如果得不到敬畏与遵守，必将对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危害。换句话说，治理闯黄灯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治理的方式。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对闯黄灯进行处罚。

这次争议，很大程度上也不在于要不要处罚，而是延伸到相关公共建设和公共管理的具体问题。比如，硬件装置是否缺位，处罚扣分力度是否适宜等等。所谓“史上最严交规”，不是一道非错即对的判断题，其中太多模糊地带未厘清，便匆匆上马施行了。立法、行政、司法的力量，如果得不到民意支撑和认同，注定会失灵。公共决策应该让民意走在前面，否则出台之后就难免招致民意吐槽。类似教训尽管太多，但“包办一切”的旧思

维，仍未根本改观。但愿这次“乌龙”能聚焦一种最大价值，就是利用好民意。

在这个社会分层的年代，也只有为民意深度介入公共决策提供更宽敞的路径，让各种话语不被搁置，民意才能集纳起最大的智慧与力量，让相关决策和执行，体现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

“暂不处罚”，说明治理“闯黄灯”摔倒在不尊重民意上，由此得到的启发应该是，让民意参与讨论，让“闯黄灯”的定性和处罚细则与法律法规实现有效对接，让相关执法行为更好满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需要。这种公共讨论本身，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汽车文明和安全精神。 单士兵

“有何大惊小怪”比公款旅游更可怕

借开会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鸿山街道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注脚。与公款旅游相比，更让人惊愕和悲哀的，是鸿山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对记者说的一句话：“这样的旅游会议在无锡其他地方都有，有何大惊小怪？”

一句“有何大惊小怪”，也暴露出了当今一些官员的腐败无意识和腐败有理的论调。这是一种可怕的腐败心理，说明一些公务员已经养成了特权依赖，耻辱感在退化，没有起码的权力节制。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公款旅

2012年12月26日，江苏无锡新区鸿山街道居民联名举报称，鸿山街道一行80余名干部远赴厦门召开会议，“借会议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2012年12月31日，该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确曾“花费了38万多元，赴厦门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并称此次活动经过无锡新区党工委书记审批同意。(1月5日《人民日报》)

游被查处的概率大小，被问责的力度大小。试想，如果一有公款旅游就能被发现，一经发现就严惩不贷，公务员

意识到严禁公款旅游是条不能碰的带电高压线，一旦触及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还敢如此心安理得吗？

近年来，中央为刹住公款旅游之风，可谓用力甚深，但公款旅游之风从未绝迹，一些人甚至感叹有何大惊小怪，这真值得大惊小怪，对此，是不是应该加大惩处力度？一定程度而言，公款旅游涉嫌集体贪污，如果不仅免去相关责任人的公职，还依法处以刑事责任，他们还敢如此狂妄吗？

公款旅游可怕，“有何大惊小怪”比公款旅游更可怕。 王石川